

梁實秋

論

文壇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時報書系 134
梁實秋 著

梁實秋論文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時報書系 ⑭

梁實秋論文學

著者 梁實秋

發行人 儲京之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

電話 三〇六六八四二

郵政劃撥 一〇三八五四

印刷者 文群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萬大路七一巷二二號

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九月一日

再版 中華民國七十年八月三十日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四號

平裝新臺幣一二〇元

精裝新臺幣一五〇元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序

幾十年來，零零碎碎的寫了一些有關文學的文字，也曾集結為幾個小冊子出版，近承友人高信羅賢伉儷不棄，要為這些文字作一總集出版，盛情難卻，勉從所請。藉這機會，願略談我寫評論文字的經過。

新文學運動肇自民國六年，在那一年胡適先生發表了他的「文學改良芻議」，從此新文學運動風靡一時。當時我只有十六歲，尚在學校讀書。我沒有進過私塾，沒讀過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我所受的語文教育是從商務印書館國文教科書開始的，我背誦的是「人、手、足、刀、尺；一人、二手，大山、小石；……」

但是稍長之後，所讀的文章不出古文的範疇，課本裏選用的作品不外是「古文觀止」「古文釋義」裏的那些篇家喻戶曉的傑作，直到二十歲左右，老師在國文課堂上還要我們默寫楊惲「報

孫會宗書「韓愈「師說」……」。可是我一面在古文圈子裏摸索，一面也開闢了新的天地，那便是偷看小說。最先偷看的是水滸傳、紅樓夢等。深感古文之格調詞藻陳陳相因，不若白話小說之平易近人。偷看小說是家庭所不許，也是學校所懸為厲禁的。但是白話小說給我莫大的啓示與喜悅，雖然我對於古文未敢公然加以贊譏。胡適先生的「文學改良芻議」，對我而言，確是發聵振聵，把許多人心目中積存已久的疑惑一下子點破了，我頓時像是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

我那時像是仰觀天象的人，

忽見一顆新的星辰進入我的視野，

又像勇猛的考提玆，鷹視鷂視，

凝望着太平洋——

新文學運動在最初階段是較多破壞性的，攻擊古文、舊詩、舊劇，無所不用其極。凡是文學運動，都是要有像樣子的作品作為基礎，然後據以發揮主張，或是別人從面抽繹原理，否則運動可能徒滋紛紜，終於落空。我們的新文學運動，在詩歌戲劇方面成就較差，而在白話文方面則突飛猛進蔚為大觀，如今舉凡抒情論說紀事以及公私文件大概沒有不改用白話的。小說本來就是白話文的天下，自不必說。詩歌戲劇因為過去有悠久嚴密的傳統，要改良便不那麼容易。在這期間，凡是文藝性質的出版品，我無不蒐集一讀，如餓若渴。學校裡的功課，尤其是老師指定的課外讀物，我常不屑一顧，同學們每天傍晚擠在圖書館門前，等着大門一開，紛紛搶佔座位，這其間從來沒有我，我總是躲在寢室裡看一些新出版的文藝作品。現在想起來很後悔，因為浪費了時間

失去了很多研讀基本典籍的機會。我所閱讀的作品很大部分是翻譯，翻譯當然是很有意義的事，外國作品給我們一種新奇感，富刺激性，擴大我們的眼界，不過要有「歷史的透視」才能認論作品之真正的價值，那時候我對外國文學的知識很有限，缺乏比較廣泛的了解，所以閱讀翻譯作品也就不大懂得選擇。凡是新出的圖書，無論是翻譯或創作，我一概歡迎，有些像莎士比亞所讚美的法國鷹獵者之見鳥就放鷹，毫無抉擇。

關於文學的知識既很貧乏，而猶敢大言炎炎評論古今者，不僅是年幼無知，也是當時風氣使然。我的第一篇批評文字「草兒評論」作於民國十一年八月（見秋室雜憶附錄一），這篇文字之作事出偶然。胡適嘗試集之後，最值注意的詩集是郭沫若的「女神」，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兒」等。那時候我和聞一多在清華組織文學社，經常討論新詩，一多對於胡適先生的主張並不完全折服，尤其是所謂八不主義，頗似美國新詩運動所謂 Imagist school 的主張，其中一部分大有商酌餘地。白話為文，順理成章，白話為詩，則問題甚大。胡先生承認白話文運動為「工具的革命」，但是工具牽連至內容，尤其是詩。工具一變，一定要牽連至內容。所以新詩的討論至今未能塵埃落定。一多和我一直不以為詩可以脫離傳統。於是一多寫了一篇「冬夜評論」，草稿交給了在西山臥佛寺夏令營的同學吳景超，景超把稿騰錄一遍交给了我，我把稿投寄了晨報副刊，副刊編輯是孫伏園先生，人稱孫伏老，稿寄之後如石沉大海，寫信去請求退稿亦不覆，我以前沒投過稿，也許是我不懂行規。幸虧原稿尚在，我就着手寫一篇「草兒評論」，自費把兩篇合印一小冊，除了贈閱之外，送幾百冊到育雲閣等處書店寄售，究竟銷出若干冊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成本一百元分文沒有收回。在這個小冊裡，我和聞一多都是把詩當藝術看，着重的是詩的內涵，與胡適先生所倡導的「工具革命」已經是兩回事了，我對新詩的看法至今沒有多少改變。這個小冊子引起兩個反響，一個是住在東京的郭沫若，他看了之後大為欣賞，寫信來說「是在暑夏吃了一杯冰淇淋」。事實上是聞一多對於「女神」着實恭維了一番，所以才有此投桃報李的一舉。不遇我和一多和創造社發生了一點點關係是自茲始。我有幾首新詩發表在創造季刊上，一多寫過一篇郭譯「魯拜集」糾誤的文章，我在創造週報也寫過幾篇東西。那時候創造社和文學研究社正處在敵對的地位，我看到小說月報雪莉專輯有矛盾一篇文字說雪莉為了一篇「雅典主義」的文字被牛津大學開除云云，「雅典主義」乃「無神論」之誤譯，我寫信給成仿吾偶然提及此事，成仿吾就寫了一篇文章「雅典主義」大事譏嘲，我沒料到引起這樣的後果。後來郭沫若要在創造月刊刊行拜倫專號雪莉專號，邀我和一多寫稿，我們都沒有應約。另一反響是胡適先生的努力週報，某一期上有一短評，作者署名為「哈」，我至今不知其為誰何，絕不會是胡先生，胡先生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哈先生指摘我不該稱錢一多的這兩行詩——

他們的笑聲有時竟脆得像坍塌了一座琉璃寶塔一般。他問我：誰聽見過琉璃寶塔坍塌的聲音？這一問，我無法回答。杜工部句：「或看鰲梁閣若上，未聞鯨魚碧海深」，杜工部可曾看見過鰲梁閣閣若？可曾看見過碧海鯨魚說？」

「王爾德的唯美主義」一文作於民國十四年，是我讀哈佛大學白璧德教授「十六世紀以後之文藝批評」一課之讀書報告，原作是英文寫的。哈佛的規定，研究生不需參加任何考試，但須交

報告一篇。題目是我自己選的，著筆之前徵得白璧德的同意，他乍看到這個題目吃了一驚，好像覺得我是有意來捋虎鬚。其實不是。我過去讀過王爾德的作品不少，極愛他的英文文筆，覺得他自誇爲「英文之王」不算是過分，從而對他的唯美主義也發生興趣，自從聽過白璧德的演講，對於整個的近代文學批評的大勢約略有了一點了解，就不再對於過度浪漫以至於頹廢的主張像從前那樣心悅誠服了。我寫這篇論文是記載下我的思想的改變。洛斯編的王爾德全集，大概有十幾大本，我一字不漏的讀過了，大學圖書館所有有關的參考書我也翻過了，用了幾近半年的功夫才寫出那樣短短的一篇文章。

白璧德先生的父親生長在寧波，所以他對中國有一份偏愛，對中國文化有相當的了解與關切，中國學生中親炙最久的是張欣海吳宓梅光迪幾位，我只從遊一年，實在是未親堂奧，他的著作，我讀過五部，即「文學與美國大學」、「新拉奧孔」、「盧梭與浪漫主義」、「法國近代文學批評大師」、「民主與領袖」，最後一部「論創作精神」比較晚出我還沒有機會研讀，他的學院派的氣味很重，引經據典，腳註甚多，文筆雖然剛勁，讀來却很吃力。他談的是文學批評，實際上牽涉到整個的人生哲學。以我的了解，他的主張可以一言以蔽之，察人物之別，嚴人禽之辨。他強調西哲理性自制的精神，孔氏克己復禮的教訓，釋氏內照反省的妙諦。我受他的影響不小，他使我踏上平實穩健的道路。可是我並未大力宣揚他的主張，也不會援引他的文字視爲權威。

民國十五年二月，我在紐約，寫了一篇「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是我學生時代第二次對外發表的批評文學，投寄北平晨報副刊，主體者爲徐志摩，那時候我們尚不會相識。在這篇

文章裡，讀者可以看出我的立場。十六年，吳宓先生蒐集「學衡」雜誌有關白璧德的文字爲一集，我題名爲「白璧德與人文主義」，由新月書店出版，這是我唯一的一次對於宣揚白璧德先生主張稍盡一點力量。這本書很少人看，只引起所謂左派人士的譏訕。我至今不會看見國內任何人堂堂正正的批評過白璧德的思想。我至今不明白白璧德的文字有什麼可譏訕的地方。去年三月台北巨浪出版社，大概是由於侯健先生的推薦，翻印了白璧德的「盧梭與浪漫主義」一書，（該書的一章我會應林以亮先生之邀請譯成中文，收在他所編的「美國的文學批評」很）。我在新月書店出版「白璧德與人文主義」一書，按常情胡適先生會要提出異議，因爲學衡一向是和胡先生處在敵對地位，但是胡適先生始終沒說過一句話，他的雅量是可佩服的。胡先生也從來沒有譏訕過白璧德一句話，雖然他們二人之間在思想上有很大的距離。新月一批人就是這樣的，各行其是，沒有門戶。有人說我「奉白璧德爲現代聖人」，這是沒有的事，我就人論人就事論事，我反對「個人崇拜」，我不喜歡「權威」，我在批評文字裡不願假任何人的名義以自重。

我在新月雜誌上一共寫了三十幾篇稿子，其中一部分是對魯迅先生和普羅文學運動的論戰。關於此一論戰我現在不欲多說，因爲已有很多人說過，我自己也說過，沒有什麼新鮮的可說，再則此一論戰本身也並不怎麼重要。事後想想，那一場筆墨官司也許不是全無意義，只是當時很少人體會到那場筆墨官司些微的象徵了以後國家大事之嚴重的發展。有人對徐志摩說，「有人在權衡新月，你們爲什麼不全力抵抗？」志摩說，「我們有陳西滢梁實秋兩個人來應付，就足够了。」這真是掉以輕心。新月沒有具體組織，沒有政治野心，不想對任何人作戰。我挺身說幾句話，

主要的是想維護文學的尊嚴與健康，有人拿文藝當武器，這也未嘗不可，抓起切菜刀殺人也是常有的事，不足為奇，不過一定要說文藝只有武器的作用，切菜刀只有殺人的效能，那就離譜太遠了，所謂階級云云，則社會有階級之分，乃是擺在面前的事實，誰也不會否認，而且階級的觀念也不是馬克斯的發明，古典經濟學者無不注意其存在，但是硬說所有文藝作品必皆有其階級性，某一作者必是為某一階級服務，這不是事實。我所要辯明的只是這兩點，此外皆是枝節。魯迅從來沒有正面和我辯論過，他總是旁敲側擊，枝枝節節的作文章，並且時而稱人為「正人君子」，時而稱人為「白璧德的門徒」，好像是帽子一經戴上便休想摘去，只好靜待遊街示衆，這種作風大概也是屬於紹興師爺的刀筆一類。其他的左派嘵嘵更不必論，有人寫文章說親眼看見我坐自用小車到大學去授課，也有人捏造小說描寫我鄉鎮入獄向杜某乞援才得開釋，其目的無非是強調其所謂階級性。像這樣的文字，除作者自貶人格之外，毫無意義。我離開上海那個是非之地以後，沒有再在這個問題上浪費筆墨。民國二十三年南京的王平陵先生為正中書局編文藝叢書，要我把新月上的文字選集成編，這便是「偏見集」的由來。名為偏見，以別於那些牽外國的「文藝政策」而宏宣正法者流的大作。書出後，首先我看到的評論是一位陳望道先生在上海某刊物上所發表的，我記得這位陳望道先生說我根本沒有見，該不到偏與不偏。這真是乾淨利落的手法。不過果無所見，又何勞評論呢？對於這位先生之不憚煩我還是很感謝的，後來有人告訴我這位先生有他的政治背景，那麼也就不足怪了。

第一篇對偏見集下嚴正批評的是李長之先生，那時候他還是一位大學的學生，他的文章登在

天津的某一期國聞週報上，聞一多特別寫信介紹他來見我。李先生是一位很有才學的青年，我們以後遂成知交。他批評我的主要論點是：我的批評文字缺乏哲學系統。他是治西洋哲學的，尤其是康德的哲學，所以特別注意哲學系統。他批評得對，我確是缺乏哲學系統。我開始反省，我的文學觀（如果有的話）是怎樣得來的，其中要點是什麼。我不喜歡給文學下定義，我以為只要認識文學，即不需要什麼定義，自然知道文學是怎樣的一種東西。要認識文學應自精讀作品始，而不是研讀批評文章。在學校讀中國文學史一課，所用課本是曾毅編著的，是文言文寫的，內容很枯燥，書是些人名書名，議論陳腐，殊不當我意！但是裡面的人名書名也提供了中國文學的一個輪廓，日後若能循序披覽按圖索驥，不失為一種書目。惟因自己慵懶，中外文學作品究竟讀得太少，許多最基本的文學古典作品都不會涉獵，至今不敢談比較文學，皆因素養不足之故。不過就我所已經讀過的一些中外作品，我體會出文學的本質是什麼，其功用又是什麼。我發現最好的文學作品無不以發揚人性為指歸，所謂人性，究何所指？圓顙方趾皆謂之人，人人皆有人性，還發揚它作甚？是又不然。「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幸虧有那麼一點「幾希」，人雖然具有若干的獸性，還有一些不同於獸性者在。「高貴的野蠻人」其實不見得怎樣高貴，在純自然境界中的人比禽獸高貴不了多少。人在超越了自然境界的時候，運用理智與毅力控制他的本能與情感，這才顯露人性的光輝。例如：人言為信，是人就該講信用，這與階級無關，與教育程度亦無關，高高在上的統治階級說話要算數，不可失信於民，斗筭小民也要信守諾言，不可失信於人，就是殺人越貨的強盜有時候也是有諾必踐，才算得上是盜亦有道。反之，事前一片花言巧語，事後

翻臉不認帳，這便是失却了人性。再例如：獸性是殘酷的，弱肉強食，人又何嘗不然？人在戰爭中所表現的姦淫屠殺完全是禽獸作風，以及人間許多下流的殘酷報復的手段，都可說是失去了人性。人性是從自然境界掙扎出來的，所以作人很難，人是要作的，隨時戒懼如履薄冰，一不當心便要墮落道途。曾文正公說：『不爲聖賢，便爲禽獸。』他的意思是說人禽之別繫於一念，人應該向聖賢看齊，不可淪爲禽獸。事實上一般的人是介於禽獸與聖賢之間的，如能超凡入聖，那是宗教的境界，我們凡人能維持人性尊嚴已經是不容易了。歷來文學傑作，無不教人向上，維護人性尊嚴，文學不是道德的說教，自然的具有其道德的意義。人性沒有階級之分，也沒有時代的變化，所以好的文學永遠是爲人所欣賞。我永遠不說文學『應該』是怎樣，『應該』有何用途，我只是說根據我的認識，文學是這樣的。如果有人不喜歡這文學之傳統的面貌，要根據什麼形上學的或經濟學的原理另創出了一套理論，賦予文學以漸的更有用的說法，那也是他的自由，不過我不相信那一套。

我也不相信根據美學原理解釋文學的那種說法。二十五年我在北大教書，和朱光潛先生同事，朱先生的學問道德都是我所佩服的，只是他對文學的看法我未能苟同。他所寫的『文藝心理學』『談美』等，是採取近代美學家克羅齊的觀點。克羅齊是繼承康德、希勒、黑格爾、尼采等一班唯心主義者的哲學家，他認爲藝術是直覺，美既不能在物質的媒介物（如顏色聲音文字之類）裡去尋求，更不能與實際生活（尤其是道德問題）發生關係。我以爲文學裡有美，但不太重要，因爲文學以文字爲媒介，而文學本身並沒有太多的音樂的美與圖畫的美。克羅齊會說藝術即是表

現，我要追問一下表現什麼。文學裡所表現的東西才是文學的重要之所在。我和朱先生在北平世界日報我所主編的一個文學副刊上作了幾回合的討論，文稿均已失佚，現在只留有我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學的美」。

前些日有熱心的朋友從美國寄我一份影印的雜誌文章，是英文的，印自「亞非研究」卷九，(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1x)，一九七三年出版，我也不知道是那個學校或機關出版的，這篇文章的標題是：「現代中國文藝批評之研究：第七，梁實秋與新人文主義」，作者是 Marian Galik, Bratislava，我也不知其為何許人。外國人批評我們，時常是根據我們的文字加以分析，相當的精確，但是未必能深入了解我們中國人特有的氣質，我們在多少年傳統薰陶之中所培養出來的品格。不過有時候旁觀者清，談言微中，這也是不能否認的。這位先生於寫了二十幾頁的分析研究之後，下結論說——

一九二八年初展開了「革命文學」之廣泛的討論。梁實秋有意無意的也參加了。左傾的批評家咀咒最烈的是「人性」的觀念（當然，他們所了解的人性和他所說的意義是不同的）。梁實秋討論到「文學的階級性」，文學與革命的關係，文學與大眾的關係。

梁實秋堅持一貫的是個新人文主義者。一點也沒有改變，只是創造與批評的範圍情形有變。在本文研究的年代之內（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他是對文學批評有明晰看法的少數人物之一。但是，他不是一位偉大批評家。他的批評之主要的缺點是他對「人性」觀念之未解釋清楚，也許是他未了解透徹。另一缺點是他幾乎厭惡所有的現代文藝作品，無論是創作或批評。

這位先生說我不是一位偉大批評家，其言是也，我完全承認他的看法之正確。從一九二四年到現在，我的觀點沒有改變，如果我在批評方面能作更善的努力，也許有更多的人同意我的觀念。我對「人性」解釋不夠清楚，自己的認識不夠徹底，也都是事實。不過有兩點，我仍然要申說一下。第一，我不會盲目的排斥一切現代作品。作品不分古今，只有好壞之別。第二，我不喜愛別人給我戴的帽子，包括新人文主義者這一頂帽子在內。白璧德教授是給我許多影響，主要的是因為他的若干思想和我們中國傳統思想頗多暗合之處。我寫的批評文字裏，從來不說「白璧德先生云……」或「新人文主義者主張……」之類的話。運用自己的腦筋說自己的話，是我理想中的寫作態度。

六六、十、十一，丁巳重陽，在台北

梁實秋論文學 目錄

序.....一

第一輯 浪漫的與古典的

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	三
戲劇藝術辨正.....	二五
詩與圖畫.....	四一
與自然同化.....	四五
喀賴爾的文學批評觀.....	五一
亞里士多德的詩學.....	五七
亞里士多德以後之希臘文學批評.....	八一
西塞羅的文學批評.....	九七
文學批評辨.....	一〇一
文學的紀律.....	一〇九

何瑞思之「詩的藝術」	一二七
王爾德的唯美主義	一三七

第二輯 文藝批評論

緒論	一五五
古典的批評——希臘時代	一六一
古典的批評——羅馬時代	一七三
中古與文藝復興	一八三
新古典主義的批評	一九三
浪漫主義的批評	二〇七
近代的批評	二二一
結論	二三一

第三輯 偏見集

文學與革命	二四一
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	二五一
文人有行	二六五
什麼是「詩人的生活」？	二七一
論詩的大小長短	二七五
文學的嚴重性	二八一
論魯迅先生的「硬譯」	二八五
所謂「文藝政策」者	二八九
紳士	二九三
辛克萊爾的「拜金藝術」	二九七
科學時代中之文學心理	三一三
現代文學論	三三三
文學與科學	三六五
詩的將來	三七五
文學批評的將來	三八一